

我的读书简史

邓一光

一、我的读书经历

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不长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,学校停课,师生们忙着写大字报、拖着“黑五类”上街游行、去全国各地搞串联,我那时年龄小,没能像大哥大姐那样当上红卫兵,四处威风凛凛,胆子也小,不敢像二姐那样满世界去看大字报,追着抄家的队伍去看“旧社会”留下的金条和旗袍,基本上待在家里自己玩。初中和高中分别是两年学制,其中初中的一年用来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,高中的一年用来“反击资产阶级教育体制”,正经上课的时间不过两年,加上小学的四,算是在学校里读了六年书。

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,准确的说,不是一个会读书的学生。读小学的时候成绩尚可,考试基本是双百分,偶尔考了98分,会委屈地哭一场鼻子,被父母说成是没出息。到了中学就成了差学生。也不知为什么,好像对那个动荡的时代很害怕,不能适应。

我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从来没有出色过,唯一露了一次脸,是高中时写作文,大概是老师让歌颂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,我不知为什么,一时冲动写了一首诗交上去,当时挺得意,没想到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嘲讽了一番。记不得是为什么嘲讽,就觉得当时挨了一耳光,又不敢还老师一耳光,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有阴影,一写作文我就紧张。

在学校读书的时间短,这个经历在我心里落下了后遗症,以后老想进学校读书。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时候,我在农村务农,当时我是知青标兵,青年突击队队长,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带人挖沼气池,到高考前一个星期匆匆看了几页书,上了考场,只考了一个地区的师范学校。我那个时候想读复旦新闻系,以后当新闻记者,没去招生办报到。第二年忙着办理回城的手续,以后再也没有参加高考。到我真当上新闻记者后,又想进学校读书,有一年武汉大学招插班生,我去参加考试,结果没考上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,我已经四十岁了,那一年听说华中师

范大学办了一个在职研究生班,专业是现当代文学,我头一个去报了名,交了八千元钱学费。以后一年多时间,每星期两天天不亮就起床从汉口往武昌赶,赶到学校去听课。记得头一堂课是王又平教授讲当代文学史论,我认识王教授,也喜欢看他把胳膊架在讲桌上激情飞扬讲课的样子,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,或者受了漂亮的阶梯教室的怂恿,课上完后,我从座位上起来,抱着书包去讲台上和王教授讨论问题。我说王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,您说一体化政治扼杀自由,市场经济带来自由环境,我认为自由经济同样是一种霸权范式,照样从根本上剥夺人的自由,现代文明没有自由可言。我话没说完,班上的学生上来群起而攻,纷纷指责我不尊重老师,竟然敢不同意老师的观点。我看出这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,是挨板儿砖的地方,便和王教授告别离去。我走了以后班上的同学们还生气,说哪儿冒出来个戡家子,以为他是谁呀?王教授痞笑道,告诉你们他是谁,他是邓一光。同学们说,哦,原来是他,难怪。

我个儿高,上课时坐最后一排。我很喜欢坐最后一排的感觉,特别是教授们在课堂里走来走去的时候,我老想,他们会不会走到我面前来和我讨论问题?要是这样,最好他先叫下课,让其他同学出去抽烟或抄笔记,咱俩单独讨论,别让人说不把师道尊严放在眼里。那一年多,听了王先霈、黄曼君、孙文宪、王又平等一批教授的课,还在学校的学生食堂里和王又平教授喝酒聊天。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,在食堂里要两个菜,一瓶酒。王教授不喝酒时冷眼看人,人都看成类人猿,一喝酒就神采飞扬,上下五千年任由驰骋。我也属于驰骋类,且绝不在四千九百九十年的时候被他丢下。但我只驰骋到一点五十分,一到一点五十分准勒住缰绳买单走人,把王教授丢在那里自己对付酒杯。有一次王教授不高兴,说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,不礼貌嘛。我说您是老师,您课上完了

可以不去,我是学生,我得去听课。王教授说你可以不去,我就不明白你来听什么课,人家交一篇作业你还交两篇,显白你能写字呀。我说了一句话,那句话说过以后王教授再也没有生过气。我说我得去听智者说话。

我读完了那个班所有的课程。老实说,那一年多时间对我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,教授们也没有改变我的写作观,但那一年多的时间,人特别安静,小说也不想写了,还老爱叹气。我想我在学校受教育的历史真的可以结束了,没必要老惦记着往学校里钻了。课程结束后,班上的同学张罗着办毕业证结业证,老给我打电话,班主任也给我打电话,我没去办,从此再也没去过学校。

我的读书经历更多的属于自觉阅读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我读到了第一本课外书——小人书除外。父母给的零花钱,我大多花在看小人书上。小学我读的是寄宿学校,星期六回家,我和二姐常常省下乘公交车的八分钱,去书摊上看小人书,然后怀着对小人书的思念,走很远的路回家——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小说《红岩》。那时我家在重庆,小说写的是在重庆发生的事情,讲一群隐匿了真实身份的革命者的故事,符合一个九岁孩子的阅读心态。以后读了《青年近卫军》《铁木尔和他的伙伴》《牛虻》等俄苏小说。文革开始后,有一次,当红卫兵的大哥从外面拖回一大箱子小说,里面有《红字》《十日谈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白静草原》《人间喜剧》《叶尔绍夫兄弟》《罪与罚》《罗亭》,是红卫兵从图书馆里搜出来准备烧掉的。那时重庆的武斗打得正厉害,为了避流弹,家里人都躲进防空洞里,我独自躲在桌子下,一本一本读那些书。如果遇上停电,夜里我就点着矿石灯读,头发因此烧了不少回。那些小说让我知道,这个世界不光是我身处的世界,还有我没看见或者看不见的世界,它们给了我最初的美好诱惑。小说中的主人公还给了我一种怂恿,我从他们的命运中逐渐意

识到,人的内心可以比他的身体自由,也可以比他的身体强大。

除了大哥拖回来的那些书,我还在组织上发给父亲的“内部读物”中读到了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。这些书是供批判使用的,父亲担心我学坏,不让我读,我就偷偷的读,有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,有时候我把自已关在卫生间里读,我以为那样做很隐蔽,像神出鬼没的地下游击队,可父亲是正规军,他不会被游击队蒙蔽,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尊重游击队,我常常被他从被窝里或卫生间拖出来煽耳光——军人家庭,一般不喜欢读书的孩子,尤其不喜欢书读到迷迷登登的孩子,这是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的道理。

我的成长期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。我在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看到过安静的微笑,身边的人总是忧心忡忡,互相攻讦,包裹在厚厚的面具里,让人无法接近和信任。书本给我带来了另一个世界,我不知道故事是虚拟的,小说旨在想象,是人类的希望所在,不知道人有幻想的要求和能力,那些幻想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与生俱来的权力,但书中世界的丰富和暖意对冷漠的现实世界的间离效果是起到了。从此我相信了一件事——看到的一切不是一切,还有另一个一切、若干的一切在不知道的地方,它们可以从书本中找到,可以在放下书本之后靠着想象找到。

高中毕业后,我下乡当了知青。那个年代,书本已经遭到过浩大的清扫,几乎已经无书可读。我从城里带到乡下的书,除了一本没头没尾的《牛虻》和几本《星火燎原》,就是知青办发的一套马列经典著作。那本《牛虻》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名气,不断有知青来借,甚至有不认识我的知青,只知道我是“那本《牛虻》”的主人,大老远的跑来借,借去了也都准时还回来了。因为书没头没尾,我自己给书做了封面,有两三次,书还回来时换了新的封面,还给画上了人物肖像画。那段时间我开始生吞活剥的读马列著作,《资本

论》和《反杜林论》我读了好几遍,根本没有读懂,能背一些文字激烈段落,每逢和人辩论时就拿出来用,常常很管用,一招制对手于死地。

有一次,我发现大队榨面房里收了一些农民家里的旧书,用来包挂面,我就拿马列著作换回旧书,等“马列”换完了,就拿麦子换。我下乡的地方是山区,土地稀缺,粮食匮乏,吃不饱饭,一年分六七十斤麦子,一二十斤谷子,剩下的就是红薯土豆了。拿麦子换旧书时很心疼,还委屈,肚子里咕噜噜的叫。那段时间最恨的就是挂面,觉得要没它们书就没人要了,我能白得。

有一次,一个农民告诉我,生产队付会计家中有“古书”,我知道后就找付会计。付会计是我在队里最尊敬的人,他和他家里人很善良,还斯文,衣裳补丁摞补丁,却洗得干干净净,说话笑眯眯的,从不说粗话。付会计带我去他家,从箱子里翻出十几册书。书是线装本的,纸页焦黄,有《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》,《庄子南华经解》,还有《又玄集》。我一本本地找付会计借,看完还去再借别的。后来付会计把那些书全都送给了我。那些书在煤油灯下伴我度过了四年,从农村回城时我什么也没带,就带上了那些书,如今它们仍在我的书柜里。

我当工人那几年,文革结束了,图书逐渐解禁,新华书店里偶尔会有一些新书买。新售的书种少而又少,每出一种,人们奔走相告,连报纸都提前登载消息新书出版的情况,用很显眼的字号。新华书店比总理府热闹,谁认识书店员工比认识外星人还不得了。每当新书首发当日,我就和同事约好,谁当天不上白班谁起早床,凌晨去书店门口排队。我排过两次,买的什么书忘了,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去,前面已经排了几十个人,到天亮后书店开门,一个挨着一个往前挪,接出一身臭汗。第二次不到两点去,仍未排到头十名。售书数有限制,好像每人不得超过三册。书店员工大声喝斥,比宪兵还厉害。有

人在书店门口打架,有人当场生病,有人因排队买书恋爱上。现在想起来十分荒唐,可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荒唐,觉得挺正常的。

那时的书价便宜,我手中一套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,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,每册定价在四毛二到五毛五,二十册没超过十块钱。

手抄本是早些年就流行开了,我读过一些,《第二次握手》之类。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,字抄得娟秀,工工整整,老厚一摞,读时老怕把纸翻破了,要小心翼翼。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手抄的《飞鸟集》,我一直珍藏着。

那个时候读书很疯狂,每到手一本书,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,说贪婪一点儿也不为过。书读得很快,不快不行,每本书后面排好几个人等着,要想得罪人,不用向人借钱或借钱给人,超期两天不还书,下辈子都是仇人。读书读到凌晨这种事常有,读乏了用冷水冲头,还写读书笔记,那叫饿急了,撑死都满足。

以后的读书经历就没有这些激烈了,书越来越多,自己也挑剔了,反倒觉得少了一些什么。说不清。

二、我的读书习惯

书是生活必须品之一,如果不是旅途在外,基本上每天都会读,但不像一日三餐那么刻板,什么时候想读了,抓起来就读,有时读到打盹,也不硬把眼皮子支起来,书丢下就睡,或者起来去干点儿别的,把书忘掉。

到手的书未必读完。大多书读不完。没兴趣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。

读书从不在书房里。曾经在书房里放了一只躺椅,读过几次,没意思,而且老分心,觉得书房里别的书都在骚动,它们挺不耐烦的。以后就把躺椅搬出书房,也不在书房里读书了。

只在一种情况下坐着读书,旅途中,否则一定会躺着读。

三、我主要读哪些书

这是世界上最傻的问题。读什么书,视阶段而言。基本由着性子。

比如前些日子,对心理问题感兴趣,读了班克特的《东西方心理治疗的历史》、罗杰斯的《个人形成论》、恩普森的《眨眼与做梦》。比如再前些日子,看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在书柜里歪着,替它整理齐,随手抽出一册,是说红蚂蚱的,站在书柜边随手翻,读得开心,又抽了两册放到枕边,那几天连读了好几册。

书读得很杂,难以归类。小说反而不似十年前那样热衷,少量的国外小说会看下去,最近读过的有胡赛尼的《追风筝的人》《灿烂千阳》,普鲁的《船讯》,施林克的《朗诵者》。遇到曾经读过的旧小说,读进去了,也会再读一遍。

四、读书生活对我的启示

说不上来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吧。除了生命,没有什么事情会是一辈子的,或者一辈子意义不变。读书也是这样。但相信一点,有的书你读过了一辈子不会忘,但不等于它不变,再读一遍,会发现它变了,不是老朋友了,是新朋友。

五、我不喜欢的书

图书种类中的大部分基本没有涉猎或者完全没有涉猎,喜欢的方向窄,由此导致不喜欢的方向也窄。就我读到的有限种类中,传记是不大喜欢的。可能有不错的传记,比如传主自己所作。大多数传记作者远离传主,自说自话,内容取自传主,却让人觉得那是在写作者,读这一类书实在是受气害。